

考古学家蒋若是

黄柏林

蒋若是,1921年出生,江苏省萧县人。1945年1月参加革命,1948年10月肄业于山东齐鲁大学,1950年任齐鲁大学文史助教,1952年中央考古训练班结业,1953年支援洛阳大建设调入洛阳,从事文物考古学工作,195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洛阳市文管会副主任、文化局副局长。1986年离休后定居西工区。现任洛阳市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河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博物馆学会顾问、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兼《秦汉分册》主编等职。

蒋若是同志早年攻读文史,大学期间从师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学田野考古学,从师墨学、古文字学名家栾调甫攻读古文字学,后得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私淑。一生治学勤奋,论证严谨,观察敏锐,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史学研究,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钱币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著述丰厚,饮誉中外。经中央文化部、河南省文化厅推选,已被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仍辛勤耕耘不辍,力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财富。

蒋若是同志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考古学方面

1953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洛阳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开始。为支援洛阳大建设,蒋若是同志从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来洛阳,负责洛阳文博考古发掘工作。当时,在洛阳烧沟发掘出一大批汉墓,为使这一发掘取得重大突破,蒋若是同志在研究洛阳烧沟汉墓群时,认真核查发掘现场,随时搜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把2百多座汉墓形制演变和1万多件出土器物类型,按其时间先后,寻求出他们之间的演化规律。用两年时间,撰写了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37.9万字、附图表、照片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的形式,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向国内外发行,一时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从而开创了以墓葬为单位,对墓型、器型进行综合排比,找出其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作为分期断代依据的先例。被中外考古学界称之为中国“汉墓编年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见《光明日报》1985年9月9日)。同时,受到日本、西德等一些有关中国考古专家和汉学家的重视与好评。如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林已奈夫就在他的《汉代物质文化》一书中多次引用《洛阳烧沟汉墓》的材料及其论点。《中国大百科全书》为该书立了专条,指出该书“给建立洛阳以及中原地区汉墓年代的序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并对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467页)。四十年来,该书一直作为大学考古专业的秦汉考古教材和文物考古界汉墓分期断代的主要依据。成为中国考古学术界广泛引用该书成果,作为研究汉代文物断代的“标尺”。正如我国老一代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洛阳烧沟汉墓》序言中所说:“这应当说是汉代考古的奠基工作,对今后各地区的汉墓的研究,有重大的‘标兵’意义。”

1956年,在孙旗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在龙山文化之下,仰韶文化之上,具有两种文化特征的新文化类型。

过去也曾发现过这种文化,大都认为,仰韶文化是西来的文化,龙山文化是东来的文化,两种文化来源不同,在豫西一带相互接触后成为“混合文化”。当时,对孙旗屯的发掘材料,有些专家认为把地层搞乱了。蒋若是同志根据发掘到的材料,分析了其中既有仰韶文化特征,又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情况,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提出了一种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论点——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形式。河南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演变而来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后来豫西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影响很大。学术界对这一新论点的评价是:“这种认识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法是辩证的”。

1957年,蒋若是同志与郭文轩同志根据考古资料编写的《洛阳晋墓的发掘》,“第一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短暂的西晋时期物质文化面貌,对魏晋时期考古研究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又最早地注意到荀岳、左棻两墓志及出土的线索,进行西晋帝王陵位置的探索研究,发表了《从荀岳、左棻墓志中得到的晋陵线索及其它》。为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划定洛阳汉魏故城以东遗址的保护范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蒋若是同志在考古学方面的论著有14篇(部),大都是五十年代由他主编和撰述的。成名之作《洛阳烧沟汉墓》开始撰写时才32岁。以后相继发表或交流的学术论著,大多“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当时,国内外考古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误认为蒋若是同志是一位老先生。1957年,日本一批著名考古学者,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来华访问,水野清一等人握住蒋若是同志的手说:“我们早就拜读过您的著作,很佩服您”。这批学者回到日本后说:这次能见到蒋若是先生很荣幸。

二、历史地理学方面

1960年以后,基本建设不多了,田野考古工作基本陷于停顿。从这以后,蒋若是同志的研究重点,从田野考古学转向了历史地理

学的研究，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的研究：即（一）古代历史文化遗址的探索；（二）历史遗迹真伪的考证；（三）洛阳古代城市的研究。与前者比较，《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是典型的、系统的考古科学发掘报告，而后者则属于文献真伪的考证研究。对于后者的研究，则全靠对古文献深厚的功力、敏锐的眼光以及卓越的才华和胆识，既重视文献、吸收前人的成果，又敢于质疑，不盲目崇信，坚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科学地对待前人文化遗产，去伪存真。这对我们今后科学地吸收前人的成果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蒋若是同志的《垓下方位新探》，以求实存真的严肃态度，在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楚汉之际的政治、军事斗争相当复杂，《史记》中有相当翔实的记载。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素称严谨，又是汉代人言汉代事，最具权威性。因而，一直为后人借鉴。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大败楚霸王项羽，是历史上一次著名战役。对于这次战争的战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重要古籍以至国内外的权威著作的记载都是在沛郡 洨县，即今安徽灵璧，在学术界可说已成定论。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记有“垓下在唐之亳州真源县。”真源县在秦属陈郡（今河南淮阳县），这个意见似乎从未受到后人重视。蒋若是同志认为，两地相距数百里，二者必有一误。他全面研究了楚汉决战的形势，认为张守节的意见是对的。经过调查研究，发表了论文《垓下方位新探》。北师大老教授赵光贤先生（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评价说，《新探》的提出，可以“一扫过去之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可畏先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责任编辑、研究员）认为：“此举在历史地理学上立了一功，表示敬佩。”并表示下次再版《中国史稿地图集》时，要根据蒋若是同志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后增加中国历代战争史）在调整中国历代战争史陈列中，为确定楚汉战争“垓下之战”的正确地点，古战部郭部长专程来洛，通过洛阳市人民武装部找到蒋若是同志，表示要采用他的“垓下”新说。

秦、晋崤之战，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战役。过去，学者对此，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作书面探索。蒋若是同志结合文献记载，亲自到实

地详细勘察,撰写了《春秋崤之战战地考实》。本文一方面纠正了《元和郡县图志》至今相传一千余年的错误,并使之翔实具体;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论述横贯东西,平行渭河、黄河的这条要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敦愿指出:“论述全面精辟,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面,在方向与方法上,都起到了示范作用。”“应是科学研究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人。”

《秦始皇车马行经九原辨正》一文,对唐代著名地理学家张守节的错误注释作了更正。秦始皇从山东出巡归来,行至河北的邢台东北死在沙丘,史称车马行从邢台、到石家庄,然后进入井陘口(即娘子关)。按理再向前走,经榆次、太谷、介休、灵石、汾城、新绛,折向西从龙门(禹口)过黄河到咸阳,这是自古以来从山西通往陕西的交通要道。就是因为《史记》上有“从井陘抵九原,从直道到咸阳”这句话,张守节可能只知道秦之九原郡在内蒙古包头市,却不知道山西新绛转入龙门的汾河湾也有个九原的地名。按他的路线走,就要把秦始皇的车马行拉到内蒙古去,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清初学者顾炎武虽有疑问,但也不敢更正,并且给张守节打了“圆场”。蒋若是同志对此进行了全面考证,提出了秦始皇车马行经九原的辨正。学者认为“辨九原千载相传之误,实乃不刊之论。”

在洛阳古都研究中,蒋若是同志著有《洛阳在中国古都中的历史地位》,“洋洋数万言,详述了洛阳的历史及其重要地位,不啻是一本简明的洛阳史。”

蒋若是同志在历史地理考证和历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有 12 篇。许多文章被同行们推为“是同类论著中的上乘之作。”一些篇章“不仅纠正了汉唐以来的诸书考证的误谬,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挥了他多年来在考古学、古文献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因而,为治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新的贡献。”一些专家在评论蒋若是同志的学力时说:今日学术界的情况是,长于考古者,往往是文献学基础不足;长于文献学者,于田野考古往往实践不足;长于业务钻研与长于组织领导者,在考古界分别有之,兼此两者,则寥寥无几;而蒋若是同志可谓四者兼备,功力深

厚,才识卓越。

三、秦汉钱币学方面

1987年,67岁高龄的蒋若是同志,接受了《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卷》的主编任务之后,深感秦汉钱币过去错误太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从战国秦半两的铸造,到东汉末年五铢钱的破坏,前后经历550多年,这是中国统一行使钱币的开始,千余年来,诸家纷争,莫衷一是,是中国古钱币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不下大功夫很难搞出个头绪来。他以坚韧的毅力,决然从头作起,利用全国考古发掘材料,严格按照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奔走于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河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毕六年之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纠正了沿袭千百年的错误。为了集思广益,吸取海内外钱币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意见。他把自己的主要论点,分类写成论文,发表在《中国钱币》、《文物》、《中州钱币论丛》、《陕西金融·钱币专辑》上,与国内外学者进行探讨。不仅完成了《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卷》的主要编写任务,还发表交换论文20篇。中国钱币学会对这批论文的评价很高。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童赠银同志在《三年工作报告》中说:“考古文博系统的专家学者也在钱币学、货币史领域做新的探索 and 追求。而这些学者的参加,使我们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取得了新的成果。如河南的蒋若是先生是考古界的一位老专家,他承担《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卷的主编任务后,在大量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秦汉货币的版式、断代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接连写出了几篇价值很高的论文。”这些论文,已被中国钱币学会列入《中国货币丛书》,即将集印发行。

为便于史学界专家研究时查阅,现将蒋若是学术论著附录于后。

蒋若是学术论著目录(考古部分)

论著名称	刊载时间	说明
《洛阳烧沟汉墓》	中国考古学专刊, 1959年科学出版社发行	37.9万字, 附图表照片, 本人负责主编、报告内容研究者及主要篇章撰稿人。
《洛阳周墓发掘》	未刊, 1955年编	本人任编写组长, 负责全书的篇章设计、内容研究, 撰写结论等。
《洛阳 30、14 汉墓》	《文物》1959年10期	专题论述我国早期砖券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洛阳唐墓》	未刊, 1956年编	本人任主编(组长), 负责部分与上同。
《洛阳宋墓》	未刊, 1956年编	与杨宝顺等同志合编, 本人任组长(主编)。负责部分与上同。
《洛阳西晋墓的发掘》	《考古学报》1957年1期	与郭文轩合作。
《关于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直接继承问题》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全国考古会议材料	最早提出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直接继承的新论点, 并为其后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已取得学术界的公认。
《洛阳两座西周墓》	《考古》1956年1期	较早论述洛阳西周墓葬的特点和形式
《洛阳古墓中的生产工具》	《考古通讯》1957年2期	
《洛阳涧西区北朝及隋唐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59年2期	论述洛阳地区北朝至隋唐墓葬之发展, 并揭示这一时期北方经济消长在墓葬中的反映。

蒋若是学术论著目录(考古部分)

论著名称	刊载时间	说明
《从荀岳·左棻墓志中得到的晋陵线索及其他》	《文物》1961年10期	较早地提出西晋王陵位置,为国家确定洛阳东郊保护区提供了可靠依据。
《中国古都洛阳文物概要》	《中国洛阳文物赴日展览》专辑序言(日文)1983年在日本印行。	对建国以来洛阳出土的珍贵文物作了综合和系统的介绍。
《唐墓陵调查纪要》	《文物》1985年3期	论述唐代陵石刻的艺术价值。
《对满城窦绾墓年代之再审定》	《中国文物报》1991年7月21日	
《洛阳孙旗屯遗址发掘报告》	1956年编,未发表	与李家华合编,本人任组长,负责篇章设计内容研究,撰写结论等。

蒋若是学术论著目录(历史地理部分)

论著名称	刊载时间	说明
《垓下方位新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3期	纠正汉唐以来各家对楚汉战争中决战地点“垓下”所在地理位置上的错误。
《洛阳古城之变迁与新市区规划刍议》	《洛阳师专学报》1985年2月	从洛阳历史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的变化,论述洛阳历代古城变迁的内在原因,提出洛阳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设想。
《洛阳建都与古代文明》	《中国古都研究》1985年3期	
《秦始皇车显车行经九原辨正》	《中原文物》1985年4期	纠正自唐以来史学传记的错误并提出“直道”并未修成的新认识。
《略论发挥洛阳古文化优势》	《洛阳经济研究》1986年	
《春秋崤之战战地考实》	《史学月刊》1987年1期	纠正自唐以来有关州、府、县、志及史学引证“二崤”地点的错误
《名城规划与规划名城》	徐州古文化会议论文	
《洛阳在中国古都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古都学会年会杭州会议论文,已列《中国古都研究》论文集第五期。	
《名城建设与文物保护》	江陵会议论文,《河洛春秋》1989年4期。	
《中国文明史渊源初探》	第一届河洛文化节论文,《河洛文化论丛》第一辑。	
《三代同源论》(初论)	第二届河洛文化节论文,《洛阳社科》。	
《三代同源与洛阳建都》	中国古都学会北京会议论文,即刊	

蒋若是学术论著目录(钱币部分)

论著名称	刊载时间	说明
《郡国·赤仄与武帝三官之考古学验证》	《文物》1989年4期	
《探寻“赤仄”与“赤仄”签定》	《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2)	
《秦汉半两钱系年举列》	《中国钱币》1989年1期	
《秦汉半两钱范断代研究》	《中国钱币》1989年4期	
《西汉五铢钱断代研究》	未刊	
《对西汉赤仄五铢钱之探讨》	《中国文物报》1990年6月14日	
《西汉五铢钱类型集证》	《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5),另有单行本。	
《徐州龟山楚王墓年代及钱币类型辨疑》	《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23日	
《莽钱疏证》	《洛阳钱币》即刊	
《秦钱论》	1992年编,待刊。	
《论“荚钱”》	1992年编,待刊。	
《东汉五铢钱》	未刊	
《就“赤仄”五铢问题答客难》	《中国钱币》1992年2期	
《秦汉钱币概述》	待刊	
《西汉五铢钱范断代研究》	待刊	
《北京大葆台汉墓年代之再审定》	待刊	
《五铢钱》	《中国大百科全书·五铢钱条》	
《论“四铢半两”》	待刊	
《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分卷》 综条	待刊	

蒋若是学术论著目录(文学部分)

论著名称	刊载时间	说明
《积金萃玉,琼瑶满室》	《文物》创刊 30 周年集刊	为《文物》创刊三十周年而作
《徐州王肯堂先生行述》	稿本	
《郭玉堂先生百年祭》	《河洛春秋》	
《徐州张伯英先生书法选集·序》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91年。	
《严子陵钓台新修碑林赞》	富春江碑林碑文	

我所接触到的蒋若是同志

王 心 杰

看完蒋若是同志的《七十自述》和《洛阳纪事》之后,使我想起了1983年与蒋老的接触。

那年6月,我在市委办公室调研科工作。当时,市委安排我们对洛阳的古文化进行调研,我们接触的第一个“权威人士”便是当时市文化局副局长蒋若是同志。他当时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对现在还有借鉴作用。

花叶并茂

洛阳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又是一座历史名城,经济建设与保护文物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在理论上、实践上一直都是一个难解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蒋老早有自己的见解。他把经济建设比作“花”,把历史名城比作“叶”,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心,是重点,没有中心和重点,什么都谈不上;但“叶”的作用是促进“花”的生长,没有“叶”,就没有养份,“花”就得不到理想的开放。是“去叶留花”,还是“花叶并茂”,是我市经济建设与保护文物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的思路。在这方面,我市有经验也有不少教训。五十年代,全国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建设项目有十个在洛阳。洛阳拖拉机厂因保护地下文物曾四次更换厂址。后来在周王城的遗址上修建王城公园,当时为的就是“花叶并茂”。但在十年动乱的年代,流传着“地下服从地上,死人服从活人”的论调,这种“去叶留花”的观点险些把洛阳变成了“枯枝牡丹”。最大的教训是洛玻的建设。当时洛玻是我国乃至亚洲第一大玻璃厂,“浮法线”却建在隋唐东都的宫城遗址上。当

时“官司”打到了北京，但谁也不能说停建“浮法线”，谁也不敢表态挖掉隋唐宫城。北京来的一些考古专家站到“浮法线”工地，心疼地都掉了泪。就象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由于它的拥有者不识货而被丢弃无法挽回一样，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可以建成百上千，可历史文化名城丢掉了就再也建不起来了。这就是历史名城的份量所在。

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是今天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1961年陈云同志来洛考察，他与众不同地提出一个问题：听说隋唐时期洛阳人口有上百万，不知供给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给洛阳的考古工作提出了研究的新课题。1969年我们在今天老城西北邙山脚下终于发现了隋唐时期的大型粮仓群，史书上称之“含嘉仓”，解开了多年的谜。蒋老亲自带领我们考察。“含嘉仓”南北长750米，东西长612米，总面积达46万平方米，有大大小小的粮窖四百多座，都藏于地下，有趣的是每座粮窖里都有一块刻字砖，上面刻着该窖粮食从何运来，是哪里的租米，管理人员和仓管制度。可惜的是，经过安史战乱把粮窖都烧了，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唯有一座。整个粮窖的构造和粟子颗粒还清晰可见，这对我们后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粮食储藏等自然科学都很有价值。日本大文学家井上靖先生参观后就说过，过去对毛主席讲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理解，现在看了这个地下粮仓我完全明白了，回去我要写文章。

我感觉，蒋老的经济观点在当时就很浓，他不赞成就文物抓文物。他主张把文物和旅游拧成一股绳，搞企业化管理。他说，一个外宾来参观就能养活几十个待业青年，抓好旅游，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就解决了。他建议市委把隋唐故城的中轴线保住。他说：“日本为了保护好古都奈良，花了790亿日元把地买下来，然后恢复宫城的面貌，复修皇宫搞旅游，人民收入不断提高。”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事业，这是棵摇钱树，有了钱可以更好的保护文物，可以建一些文化工厂、旅游企业，洛阳传统的字画、宫灯、刺绣、拓裱、石刻、唐三彩等产品都可以组织生产，可用这些产品换取外汇，不能端着金饭碗要饭吃。这些观点及道理通过十年来的实践逐步被人们认

识和接受，现在蓬勃发展的民办旅游业就是很好的例证。

上台“修庙”

文革过后，白马寺已被“横扫”一空。刚刚恢复工作的蒋老同我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文物工作者们抓住机遇，苦干一年，先后用 30 辆汽车从北京调运了大批佛教文物，现在白马寺庙里的十八罗汉等就是当时从北京故宫调来的国家一级珍品（在全国是唯一的一套元代夹纻佛像），同时又对殿舍进行了全面修缮。若不是我们下手早，现在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一件文物也拉不出来了。当然文物是不能创造的，它是历史遗产。但如何开发利用，有很多文章可做。关林庙原来只是洛阳市的重点文物，蒋老和考古工作队的同志们开动脑筋，把原收集发掘的分散在全市民间田野的历代石刻，墓志收集起来，放进关林庙，加以陈列宣传，使这座“庙”一跃成了我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办了一件一举两得的大好事。现在到关林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有的学者赞叹：洛阳真正的文化在这里！如果有可能，我要在这里住上一年，来进行研究。

古文化之塔

洛阳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之最，我们是那次调研中从蒋老那儿了解到的。

在全国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中，我们洛阳最大的特点就是地下埋藏的古城多古墓里文物多。北邙山古墓群是列入到国家重点保护项目的。从时代来说，几乎每个朝代的都有。中国历史真正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就是洛阳这座城市。古人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唐宫路与定鼎路交叉口处有一下凹的圆形建筑，这是唐代皇帝当年祭天的神宫，它比北京的天坛还早九百年，是我国建筑史上最早的圆形建筑之一。汉魏故城遗址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太学，学生最多时达 3 万多人，我国历史上第一代

“经师”如郑玄、马融、蔡邕、班彪、张衡等，都在这里授经讲学，著名的《汉书》、《后汉书》都是史学家在这里完成的。他曾说：“汉魏文章半出洛阳。”鉴于洛阳众多的历史文物，蒋老提出过一系列的建设和设想。如，建一座象征洛阳九朝故都的“古文化之塔”，塔高九层，一层标志一个朝代，把已发掘的文物珍品放进去。由名人撰文、名人书丹、名人雕刻的“三名”作品进行装修。这座塔若能建成，洛阳在世界的知名度将“身价百倍”。又如，在保护现有文化遗址的基础上，把一些名胜古迹复原，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再修一条皇宫环城路，将来还可以搞环城一路、环城二路……把道路建设和旅游线路、历史名城风貌、文物景点连结起来。

那次调研结束时我们向市委提供了一份关于确立洛阳古文化优势的调查报告，对洛阳“三大优势”乃至后来的“五大优势”的确立都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调查报告中的许多素材及观点，都离不开蒋老。在整个调研过程中，他是调查的对象，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他既是我们调查的带路人、讲解员，又是值得我们恭恭敬敬学习的老者。从1953年到现在，40年来，蒋老一方面做文物的行政管理工作，一方面进行历史、考古学研究，同时还接待了不少国家高级领导和中外专家学者，为保护国家历史文物，继承弘扬祖国文化、宣传中国、宣传洛阳，以及为洛阳的两个文明建设都做出了贡献。1983年那年蒋老63岁，已经从行政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又做了七年的安排，用自己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继续从事中国文化发展与古代交通的研究。

（王心杰，女，现任中共洛阳市西工区委员会副书记）

豫皖苏三地委 开展徐州城市地下工作简况

李 华 农

1941年,萧铜县委敌工部就开始对徐州开展工作。1946年初,豫皖苏八地委以萧县县委城工部为基础成立的徐州工作委员会和1947年1月成立的豫皖苏三地委城工部,都相继对徐州进行情报和策反等方面的工作,前后派往徐州做地下工作的约十余人。其大体情况是:

1941年秋,由萧铜县委敌工部(部长路继先)派往徐州的有蒋若是和石西岩(化名石随风,1942年以后转交给淮北区党委及徐工委领导)。

1942年底,萧铜县委敌工部又派许广智打入驻萧县孤山的伪军中当兵,后来调往徐州,升为排长,他曾向敌工部多次汇报过徐州日伪军驻防及活动情况。

1944年,再次派郑达、孟捷、吴孝书三人通过报考徐州中学进入徐州,在学生中做学运工作,搜集情报。郑达任党小组长。他们曾利用同乡关系,同在日本人控制的特高科当便衣特务的唐朝举结交朋友,逐步争取唐转变为我方搜集情报。至1945年夏,发现敌人对唐产生怀疑,为防不测,唐朝举带短枪两支,逃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1945年,萧县县委敌工部(部长李华农)派党员孟繁超利用亲友关系,打入徐州市内,在坝子街某粮行当伙计(主人姓张),后来被特务发现,遂撤出。

1946年初,豫皖苏八地委徐工委(书记黎靖)安排党员杨存俊以灰色面目取得国民党区长的信任,打入徐州,在南关某药店当伙

计,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

1947年,豫皖苏三地委城工部,派胡海萍利用他丈夫与国民党徐州“剿总”补给区中将司令刘焜的同学关系,打入徐州,以小学教员为职业掩护,做刘焜及其家属的工作,从交谈中获取情报,并争取刘焜本人的思想转变。后来刘焜终于在广州起义。

为保证联络畅通和安全,我们还在徐州外围设立了两个秘密工作联络站,一处是徐州南三堡车站联络站,站长朱传友;一处是徐州西黄口车站联络站,站长胡道民。并配有秘密交通员朱世福等。朱世福家住徐州大同街,负责交通联络工作。

上述这些地下党员和工作关系,在徐州活动时间最长的是蒋若是。1941年上半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摩擦的影响下,我津浦路抗日根据地形势日趋恶化,坚持在皇藏峪一带活动的萧铜县委派蒋若是通过亲戚关系,把全家搬到徐州居住,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工作。

1. 掩护同志。当时的津浦铁路,路东和路西虽然只有一路之隔,但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想越过铁路是非常危险的。路东的同志要到路西去,就得在津浦铁路的官桥车站上车,经徐州转道西去,再在陇海铁路的杨楼车站下车。路西的同志到路东去,也得经徐州转道南去。这样,蒋若是的家成为自然的“交通站”。为了使来往的同志安全进出徐州,必须持有“良民证”,否则就无法通过“卡子”,也无法应付敌人经常在夜间突击查户口。为此,蒋若是想方设法结交了一个管户籍的警官叫墨景彩,从他那里搞到户籍证明。开始偶而托他办一个、两个,后来关系混熟了,这个姓墨的又升了“巡官”,办理“良民证”的钢印在他手里掌握着,就更方便了。

2. 搜集情报。主要是了解敌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军事行动(如日伪军搞“扫荡”)等情报。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较大。因为同日本人不好结交,语言又不通,伪军根本不了解日军的意图,等到伪军知道准确的消息,送情报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蒋若是利用一个朝鲜人同日本人接触较多,同时又经常受日本人的气这层关系,千方百计搜集情报。这个朝鲜人叫安田伊佐绪,他以随军经商为